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历史学

中国近代史卷

主编 汪朝光

顾问 张海鹏 曾业英

兰州大学出版社

K25/85

主编
汪朝光

中国近代史卷

历史学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20shijizhong huaxueshujingdianwenku

顾问 张海鹏 曾业英

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
中国近代史卷
汪朝光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5.375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3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311-01698-3/K·218 定价:31.00 元

出版例言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百年，也是学术研究新旧交替、硕果叠出的一百年。其间涌现出的不少学术大师、著名学者及其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为中华学术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树起座座丰碑。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21 世纪中华学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起点。但是，20 世纪又是新潮激荡、世事纷繁的一百年，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泛滥、人心的浮躁，又使学术园地中嘉卉与莠草同在，美玉与瓦砾共存。久而久之，许多学术瑰宝将有湮没无闻之虞，后学新进则颇费搜寻爬梳之劳。因此，为披沙简金、嘉惠后学，让一代又一代学子能获前贤之薪传，更快地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在咀嚼英华的基础上去更好地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之发展，我们在广泛征求学界意见的基础上，特邀著名学者为顾问，委托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力求从浩瀚的学术文献中精选出本世纪各学科最具学术价值、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论文，编为《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作为世纪之交的一份厚礼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经典文库历史学部分的选编工作历时近两年，各位学术顾问和各卷主编本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严格公正、务精求真、兼容并蓄的原则，广泛搜求、反复比勘，在确保入选论文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创新性的同时，又兼顾本世纪各学科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各种学术流派观点的多样性、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互补性；要求入选的论文或能对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其观点曾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或在资料的挖掘、整理、考证和运用上极具功力，有重要的建树；或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对象上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总之，它们应能代表 20 世纪不同时期各学科主要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集中反映一百年来中华学术的发展脉络，并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供后来者学习、参考和继承。

由于考虑到广大读者的承受能力，本文库的容量不可能太大。从而使许多学术大家的精品，尤其是长文被忍痛割爱，这使我们深感不安，并怀遗珠

之憾；于是，在无法求全的情况下只能转而力求其精，尽可能确保每一篇入选作品的质量，以乞谅于各位前贤和广大读者。

本文库编选、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及其亲属们的首肯和支持，得到各位学术顾问的悉心指导，也受到学术界众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这些都使我们深受鼓舞。本文库能得以问世，离不开他们的关怀，更离不开诸位主编的辛勤劳作。我们谨在此向一切关心、支持、帮助和参与这项工作的师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库入选的作品均标明原出处，并附每位作者的简介。除对个别长文做了节选、对个别论文略有删节并做说明外，对绝大部分文章都全文照录，仅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和规定，对原文中的繁体字、数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等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并校改了原文中个别因手民之误造成的错漏。尽管我们已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本文库还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恳请学术界各位师友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使它能在再版时做进一步的修订。

惟愿《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能够成为联结昨天、今天和明天几代学人的一座学术桥梁，成为沟通海内外中华学人的一条学术纽带；相信20世纪中华学术的优秀成果一定会在21世纪发扬光大，使中华学术跃上新的巅峰！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

目 录

出版例言	(1)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胡 绳 (1)
中国近代史问题	刘大年 (12)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	罗家伦 (44)
中国社会之分析	朱伯康 (62)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齐思和 (78)
琦善与鸦片战争	蒋廷黻 (111)
金田起义考	罗尔纲 (128)
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	王庆成 (144)
重评洋务运动	黄逸峰 姜 铎 (165)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陈旭麓 (182)
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李时岳 (203)
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	丁名楠 (216)
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	张荫麟 (230)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汤志钧 (254)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 侃 (259)
论辛亥革命	吴玉章 (269)
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	章开沅 (282)
孙中山和中国的近代化	金冲及 (300)

论五四运动	黎 澍 (311)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地位和作用	齐世荣 (322)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陈翰笙 (347)
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	王业键 (367)
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吴承明 (384)
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	全汉昇 (395)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	罗荣渠 (432)
近代史上中外经济关系的全方位评价	汪敬虞 (450)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 ——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	汪 熙 (470)
编者后记	汪朝光 (485)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胡 绳

—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需要创新，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论点，发现新的资料。

一切学科都要前进，都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研究是研究过去的事情的，它如何前进？如何创新呢？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的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但是，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以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所以我们虽然绝不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去随便改造历史，但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并要在研究中有所创新。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或者从中国近代史中无论举出哪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并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有所侧重。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现在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过去的事实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实践而才能深刻

地看出来，这种情形也是有的。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已往的历史之所以需要反复研究，并且能够有所创新，我想，根本点就在这里。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那当然更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

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许多人长期研究所取得的，并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也还需要我们反复地加以阐明。例如说，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过去一般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段时期。其实，按照社会性质来说，整个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轻易取得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几代人流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对于前一代人，这也许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成问题的结论，但对后一代人，也可能还不那么清楚，还需要加以解释和证明的。

真理不怕重复，在重复中也可以有创新。历史的真理是需要反复地加以申述的。为了使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认识和接受真理，不能简单地把已经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我们现在需要结合当前的实践，对这些值得重复的正确结论，进行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为此，我们就要收集和 research 更多的资料，作出更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进行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这种工作，虽然好像说的是老话，但仍可以有新意，这里也就包含着创新。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过去的错误结论，要加以修正，而代之以正确的结论。对于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加以坚持，并且给予新的论证。

二

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没有作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充分。

究竟怎样才算是对历史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这里谈一些看法：

单纯积累起一大堆材料，这不能算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即使材料摆得

很充分。有这样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把史料考证清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那就要考证出哪一个记载最为可信，这就是历史研究。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不同的记载，那就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按照这种学派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烦琐的考证，而且止于罗列一堆历史材料。

我们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工作的。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某些历史事实的细节，如果对了解全局有关，花气力进行考证、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轻重，不管它对全局的了解有无意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那就势必陷入烦琐的考订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史料学的工作，不过是史学研究的开始，决不是它的完成，决不像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一派的想法一样。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例如，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这一百年的历史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的认识。又例如，这次会上讨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封建主义的政权，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农民革命的政权。这也是企图对太平天国得出一个本质的认识。当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的科学研究的任务？我想，这仍然只是作了历史的科学研究的开始的一步工作，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系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还远没有完成。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所谓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从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得出一个概括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的确反映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反映了隐藏在众多的现象后面的本质，那就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把历史现象的一切复杂性、多样性全部反映出来。这种概括的认识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举例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一贯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斗争的具体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斗争有时主要是反帝，有时主要是反封建，有时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而很多是不自觉的，有时甚至表现为低级的歪曲的形态。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时，也还经过不充分自觉到充分自觉的过程，有时还因犯了错误而遭到挫折和失败，而且在各个

不同阶段分别着重反对某一个敌人，而不是平均用力地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总之，虽然从总体来说，从本质上看，一贯地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实际现象决不是这一句话就说完了的。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在历史舞台上的许多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是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抽象的、规律性的概括认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才不至于陷入纷纭错杂的历史现象的海洋中，无法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无法驾驭所遇到的一切史实。但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毕竟不在于只是得出某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以这些概念（如果这些确是科学的概念）为线索，使纷纭错杂的历史现象井然有序地展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既要从事具体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是第一步，又要把这种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回到历史舞台上具体的人和事上——加以说明，这是更重要的一步。

在这里还可以说一下，我们从具体历史现象中得出的某个规律性的结论，究竟正确不正确，怎样能够得到检验呢？列宁曾告诫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如果我们是从个别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又用这结论来说明这一些材料，那当然毫无意义。我们应当尽可能掌握具有全局性的材料，从中得出结论，并且带着这个结论回到广泛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不但不回避，而且要敢于面对那些看起来和自己的结论不相适应的具体现象。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贯穿一切，把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都说明清楚，那么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这个结论不足以说明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那就要加以修正和补充。这可以说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一种形式。对于已往的历史的认识是否正确，当然不可能用现在的实践来证明（虽然有时可以参考），而主要是用已往的历史实践来证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应该经得起一切有关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检验。

如果我们对某一段历史确已取得了科学的认识，能够以此为线索把有关的具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如实地展现出来，把本质隐藏在其内部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科学研究就做得比较充分了。

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历史材料也好像是

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的。应当按照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我们所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

从纷纭错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又据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这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由于历史研究所处理的是过去的事情,不但其前因,而且其后果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更便于我们来运用和学会这种方法。科学的历史研究,除了给人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外,又能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锻炼自己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如果我们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我想,是可以从这两方面给人以好处的。

三

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并不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的著作家,如湖南醴陵人刘彦,他曾经任过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当过大学教授,当过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在1910年出版了一本《中国近时外交史》,已提出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划线。以后20年代初,开始有些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而不能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这些著作,一般地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题。刘彦的著作,在1910年出的那本书,后来在1927年扩充改写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他的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解放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有反爱国主义的。例如蒋廷黻,曾任过大学教授,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他著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他讲鸦片战争,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他说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的这种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界中也很少有人赞同。他的立场是反爱国主义的。

解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努力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作出科学分析,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呻吟,提高到理性认识,阐明中国争取民主进步和争取独立斗争的一致性,批判丧失民族自尊心

的反爱国主义论调。在爱国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一起。

现在，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在人民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也要担负这个任务。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更应该重视这个任务。中国近代史可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来之不易，使人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增强信心，使人们懂得，中国人决不能闭关自守，傲慢自大，但同时也必须要有充分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能够担负起爱国主义教育任务也不那么容易。简单地重复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的著作是不行的，当然更不能靠标语口号式的结论，这里也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研究。去年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讨论 19 世纪末年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我们对过去的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不但由此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政策和策略，而且从这里看出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我们今天实行的开放政策的本质区别，也可以看到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有些什么事情应该注意。把这类问题提到科学研究的水平上来是必要的。

四

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得与失，很需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浮光掠影的总结。这项工作，我们还做得很少、很差。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虽然在整体上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错误，并且从科学的要求来说，对于正确的结论也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出现某些偏向和错误，加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不少错误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得不好，运用得不好而产生的，这同“四人帮”统治下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不能相提并论。

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对史料的编辑、考订，以及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以前，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如何

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以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蒋廷黻就是以这种观点来描述中国近代史的。他赞赏同治年间主持总理衙门的文祥、奕訢，也赞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搞的洋务，惋惜他们的失败。他认为如果曾、左、李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采取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觉得辛亥革命也似乎可有可无。至于对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认为只是起破坏作用。在旧中国，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这个观点，认为中国要从农业国家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首先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没有独立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富强国家。在旧中国，有些好心的善良的人不懂得这点，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至于奕訢、文祥、曾、左、李以及张之洞等，是以兴办“洋务”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这种失败和上述善良的人的梦的幻灭，性质完全不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蒋廷黻等学者以为可以继承洋务运动的事业，抑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对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确实有未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发展成为近代的工业国家的，例如日本就是。但中国没有过“明治维新”。“百日维新”是想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清末的预备立宪也是想走这条路，但是走不通。不但维新和君主立宪行不通，辛亥革命也没有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不是去否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而是要对这个历史事实给以科学的论证、深刻的说明。

中国是不是要经过革命才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这已经是历史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近代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运动（包括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和以后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然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才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把现代化的建设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虽然我们国家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将中心任务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

须肯定，今天的建设事业是过去革命运动的继续。没有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长期革命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建设事业。

现在，国内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我们还有国内外的敌人，我们还要和这些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保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革命任务并没有结束。从中国近代历史上，明确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对历史估价的问题，也是和现实生活有关的问题。

五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的阶段。对这个特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必须认真考虑到。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谓半封建就是半资本主义，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因为是半资本主义，所以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开始属于资产阶级，以后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阶段，但是旧中国毕竟并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原故。它具有同别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相同的共性，同时，又有它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是由于它的前身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也不能不面对某些特殊的问题。

在旧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大资产阶级也是反对革命的，而另一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独立地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中曾制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民国初年也曾经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但只是一纸空文的徒具形式。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它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要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出现这个阶段；也不因为人们想要有这样一个阶段，就出现这个阶段。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或者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为中国规定的命运就是如此。

在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少了个独立资本主义阶段，的确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等方面，都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我们还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中，继续肃清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我们曾经因为不注意这个问题而犯了错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是与此有关的。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后，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选定了的，是中国历史不可逆转的道路。如果以为中国缺少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而应该补上这一课，那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就这个问题来说，过去从来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后更不可能做到。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历史赋予我们这样的任务：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学会的那些好的东西，并且学得更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扫除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扫除掉的那些坏的东西，并且扫除得更干净。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虽然研究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但应该能够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且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更加健全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

最后说一下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过去，为了反对那种否定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旧中国的著作中是习见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中，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的评价出现了过于“拔高”的倾向。这种倾向应该纠正。但它并不是在学术界中居支配的倾向。就太平天国的研究来说，一方面我们过去对太平天国的弱点，作过比较恰当的分析，如1951年《人民日报》纪念太平天国一百年的社论。在另一方面，的确也有一些著作，作了某些不切实际的评价，甚至对于单纯农民革命中难以避免的弱点也曲为解说，加以美化。

现在，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总结经验时，特别深切地感觉到中国社会经过长期的封建历史，具有广大的小生产经济的特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广大的小生产经济是滋长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不

讲究效率的坏习惯的基础。近代史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特点，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我觉得有下列几点可以说一下：

第一，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能不具有各种弱点，即使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但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都生活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表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也不能不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都受到影响。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大资产阶级不用说，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封建性。中国无产阶级是有其突出的优点的，但这种优点中也包含着弱点。它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这当然是优点，但也因而容易受到农民小生产者的影响。农民所具有的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无产阶级的身上。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在对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弱点进行科学的分析时，必须充分肯定农民在近代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说，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阶级，但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上说，农民群众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能缺少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敢于向下层群众中寻找力量，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不敢做的，但是辛亥革命终究没有能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也就不能不失败。无产阶级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就因为无产阶级的党领导了广大的农民，把农民群众的力量组织和发动起来的缘故。

第三，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看到我国是一个有八亿农民的国家，这是一种困难。从它造成困难的意义上说，八亿农民好像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包袱”可以转化为财富。清朝时候有一个官员向英国人说，如果我们中国每个人衣服的袖子都长一寸，你们兰开夏的织布工厂就得成倍地增加生产。外国资本家也曾寄希望于中国的市场。但是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所以人口众多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现实的市场。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八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富裕起来，逐步地提高文化，那将成为多么巨大的力量。单就市场这一点说，八亿农民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如何建设富裕的、民主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农村，这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础。我们近代史研究者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有所贡献。为此，我们就一定要对农民的弱点作恰如其分的分析，并且充分地估计农民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